

〈特集〉

大学間協定4 大学合同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東アジア文明の伝承と発展」

《公论报》副刊与台湾光复初期的 中华民族文化重建研究

张羽 贺迪*

内容提要：1947年，李万居创刊《公论报》，直至1961年停刊，发行时间长达十四年，是台湾光复后发行时间较长的报刊，该报副刊多达二十余种，这些副刊对研究光复初期台湾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思想意义。因常常引用和延伸讨论上海《大公报》发表的重要社论和文化议题，《公论报》又被称为台湾的“大公报”。作为《公论报》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文艺副刊“日月潭”和“游艺”栏延续了台湾《新生报》“除旧”与“布新”的文化使命。“日月潭”、“游艺”副刊与《新生报》“桥”副刊成为“二二八事件”后，两岸知识分子共同建构的台湾重要舆论平台。在赓续“五四”传统方面，《公论报》作者群坚守用文艺来改造国民性，倡导发扬“五四”人文精神。

关键词：《公论报》；“日月潭”副刊；“游艺”副刊；台湾文艺场域

1947年10月25日，李万居⁽¹⁾同黎烈文、陈祺升、蔡永胜、陈其昌⁽²⁾创

* **基金项目：**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百年台湾文学中的中华民族叙事研究”（项目批准号19ZDA279）

作者简介：张羽，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台湾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贺迪，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生。

(1) 李万居（1901-1966年），字孟南，生于台湾雲林梧北村，幼年接受孔孟、四书等传统教育。因父母早亡，家境贫寒，李万居曾到嘉义当盐丁，时逢蒋渭水等人领导组成“台湾文化协会”，李万居深受影响，坚信“唯有祖国的强大，台湾才有希望”。（见杨锦麟：《李万居评传》，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12页）1924年，李万居到大陆求学，师从章太炎等人。1926年，李万居赴法国攻读巴黎大学文学院社会学专业，接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潮影响，在法期间加入中国青年党。1932年，赴上海。1940年，李万居进入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以香港《申报》编纂者为掩护，负责收集对日情报。1944年6月，李万居受聘并兼任国民党“台湾调查委员会”专门委员。1945年10月，李万居返台参与光复后新闻工作，担任《台湾新报》社长。1945年10月25日，李万居将其更名为《新生报》发刊，是台湾光复后重要的报刊。杨锦麟的《李万居评传》和王文裕的《李万居传》探讨了李万居生平及人物关系、“办报”、“问政”、“组党”几个方面。

(2) 黎烈文（1904-1972），又名六曾，湖南湘潭人，笔名达五、李维克等，曾任《申报》“自由谈”

办《公论报》，报名由黎烈文题写。李万居担任报社社长，陈祺升担任发行人。该报涉及社论、政经、时事新闻、各地通讯和生活资讯等方面，其中第四版或第六版常刊载文学创作、影视戏剧、台湾风俗和漫画艺术等等。《公论报》以“民间性”和“地方性”为创刊特色和目标，秉承“民主、自由与进步”⁽³⁾之宗旨，直至1961年3月停刊。相比光复后各类报刊办刊时间较短，《公论报》发行时间长达十四年，副刊多达二十余种⁽⁴⁾，成为我们观察光复初期台湾文艺建设的重要副刊。副刊主编包括大陆籍人士如白克，也有台籍“半山”如陈奇禄⁽⁵⁾等人。自《公论报》1947年10月25日，创刊伊始，即在第四版开辟“日月潭”副刊，直至1961年2月28日，约发行2860期，先后由陈玉庆、王聿均、萧铁、王鼎钧等人担任“日月潭”副刊编辑⁽⁶⁾。关于“日月潭”副刊的命名之缘由，创刊号曾有如下声明：“我们常把‘日月潭’来代表台湾，到台湾的人谁都想上‘日月潭’去游览。‘日月潭’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是

副刊主编，后受李万居邀请1946年到台北任《新生报》副社长。陈其昌（1904-?），祖籍为福建泉州，1922年赴大陆求学，后参与抗日运动，曾就读上海大学，后赴日，1929年被遣回台，参与蒋渭水等人组织的抗日爱国运动。频繁往来两岸，1946年返回台湾，1947年与李万居共创《公论报》。陈祺升、蔡永胜生平不详。

(3) 王文裕：《李万居传》，台中：台湾省政府印刷厂，1997年，第70页。

(4) 《公论报》中，与文艺紧密相关，按照出刊先后顺序排列如下：“日月潭”（1947年10月25日-约1961年2月28日，约2860期）；“游艺”（1948年4月19日-1949年3月14日，共47期）；“艺术”（1949年4月10日-1950年11月22日，共76期）；“文艺”（1949年9月12日-1950年8月28日，共42期）；“文艺论评周刊”（1952年2月7日-1952年9月24日，共31期）；“中华文艺周刊”（1954年4月18日-1954年12月5日，共29期）；“蓝星周刊”（1954年6月17日-1958年8月29日，共211期）等。根据原刊比对，“艺术”和“文艺”副刊均比陈明成记载早一天，在此以笔者查找到的原刊时间为准。参照陈明成：《秘境与弃儿——初步踏查〈公论报〉文艺副刊》，《台湾文学研究》，2014年12月，第7期，第78页。

(5) 陈奇禄（1923-2014），台湾台南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返台后曾主编《公论报》“台湾风土”副刊。

(6) 1947年陈玉庆在福州恰逢黎烈文招募采编人员，故应聘至《新生报》，后受李万居委托为《公论报》副刊主编。王聿均（1919-2007），亦作“王聿钧”，山东费县人，笔名有燕然、谛谛、鲁民等，曾任职青岛《民言报》《艺文周刊》，1949年7月到台湾，在郑士谔的引介下认识李万居，遂为《公论报》“日月潭”副刊主编，任期约2年。《王聿均先生访问纪录》中有载，“原任编辑陈玉庆调任外勤记者……除总编辑外，有总经理蒋伟之、总主笔倪诗坛、采访主任于衡、编辑主任黄星照、资料室主任李梅生、秘书主任钟国元等人……我担任副刊编辑时，对于选稿的标准，一概以内容的是否充实，是否有创见为主，对台湾本土作家和外省作家的作品，都一视同仁，无分轩輊。我编‘日月潭’副刊，纯粹以文艺作品为中心，有时刊登几篇游记、掌故、札记等，作为陪衬，很少政治意味较浓的文章。”作者评价李万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方面，反而拙于应付。所以《公论报》一直是惨淡经营，经费常是捉襟见肘。”见陈仪深、黄克武等访问：《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21-28页。

一个优美的，吸引人的名词了。我们同样有这种期望，本刊将恳切地与读者们握手，也许很快地能成为读者们普遍而亲密的友人。上面所说，是我们借用‘日月潭’为刊名的原意。本刊愿以自然而不变地态度来亲近读者，来反映现实，来为大众效劳。”⁽⁷⁾多年后，命名“日月潭”的首任主编陈玉庆回忆称：“我把副刊定名为‘日月潭’，寓意于本土性、永恒性（日月）和公谈（潭）性”⁽⁸⁾，表现出编者对“日月潭”副刊的期许，以“本土性”强调该刊扎根台湾现实；以永恒性强调该报的生命力；以“公谈性”强调在公共场域探讨重要文化思想的希冀。《公论报》副刊成为我们观察光复初期台湾文坛的文化力量交织、文化观点汇聚的重要媒介。

光复初期两岸文化的融合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黄英哲在《战后台湾文化重建》⁽⁹⁾指出：国民党接收台湾初期进行的文化重建工作是将台湾“中国化”的“国民建设”。作者认为，许寿裳、黄荣灿和魏建功等人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以鲁迅精神作为思想基础，试图将“五四”与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化建设相结合，此与国民党高层所主张的以“三民主义”进行的文化重建脉络不同。徐秀慧在《战后初期（1945-1949）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¹⁰⁾以文化场域理论为依托，认为光复后台湾民众渴望回归祖国，外省进步知识分子、返台“半山”或是一直以来在台文化者与地方士绅，形成了一个共有的文化自主性场域，一方面，他们跳脱省籍矛盾，共同宣扬民主和平等，抵抗封建、官僚的国民党当局；另一方面，他们有中华民族认同，共同纪念“五四”运动，思索台湾文学的发展方向，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作者认为“二二八事件”之后，文化场域中的左、右翼联盟再次分化，或对1970年代以后的台湾思潮产生影响。黎湘萍从“公共领域”角度出发，更进一步地指出：光复初期台湾发行的报刊是此时期“汇集了‘公共意见’的、介于政治领域、

(7) 编者：《创刊献辞》，“日月潭”副刊创刊号，《公论报》，1947年10月25日，第4版。

(8) 陈玉庆：《也慨谈〈公论报〉一段因缘》，《联合报》“联合副刊”，2007年6月13日，第E7版。

(9) 黄英哲：《战后台湾文化重建》，南京：江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作者指出：“国语推行委员会”针对语言普及和“言文一致”；“台湾省编译馆”针对教育和研究；“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针对文化产业的审查和宣传来重建台湾文化体制；“台湾文化协进会”及机关杂志《台湾文化》主要在传播“五四”新文学和“三民主义”，承担了一定的社会教育角色，以上四个组织形成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关系。

(10) 徐秀慧：《战后初期（1945-1949）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台北：稻香出版社，2007年。（后修订为《光复与变奏——战后初期台湾文学思潮的转折期（1945-1949）》，台南：台湾文学馆，2013年版。）

社会领域之间的‘媒介’”(11)。“二二八事件”和“国共内战”是破坏这一公共领域的主要事件。

本文所讨论的《公论报》是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半年后创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两岸文人合力修复和重建台湾公共舆论平台，在文化、政治和社会等领域，促进对话与发声的积极行动。关于《公论报》文艺栏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副刊研究、作家作品、以及“女兵与母亲文学”论争等方面。台湾学者陈明成先后发表《秘境与弃儿——初步踏查〈公论报〉文艺副刊》《侧论早期的“李万居／〈公论报〉现象”——以战后三次的“艺文”刊评及其历史脉络（1945-1957）为考察对象》(12)等论文，整理了《公论报》中台籍作家和作品，如引介西方思潮的叶石涛、针砭“二二八”担忧台湾社会未来走向的杨逵、忧心“国共内战”的陈逢源、注重台湾“风土书写”的杨云萍，以及杨炽昌、吴瀛涛、王白渊、张深切、林海音、张良泽、叶日松和李荣春等作家，并对《公论报》和李万居进行历史定位，审视其局限性和社会影响力。余巧英与朱双一的论文《“白色恐怖”受难者黄藻如在台湾的创作》(13)考证了黄藻如以多个笔名在《公论报》上发表的作品，认为其白居易研究系列短篇融通古今思想，诸多短论关注台湾社会现实，抨击国民党体制，具有反思“国民性”的“鲁迅身影”。余巧英的博士学位论文《语言转换、文化重建与两岸文学汇流：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研究（1945-1949）》(14)部分章节以《公论报》为研究对象，分析谢冰莹《一封无法投递的信》所引发的“女兵与母亲文学”论争，探讨了光复初期台湾文坛关于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人民关系之分歧，以及文学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等问题。

(11) 黎湘萍：《台湾光复初期公共领域的建立与文学的位置：1945-1949》，《华文文学》，2013年第1期，第83页。

(12) 陈明成：《秘境与弃儿——初步踏查〈公论报〉文艺副刊》，《台湾文学研究》，第7期，2014年12月。

陈明成：《侧论早期的“李万居／〈公论报〉现象”——以战后三次的“艺文”刊评及其历史脉络（1945-1957）为考察对象》，《台湾文学研究学报》，第23期，2016年10月，第211-254页。

(13) 余巧英、朱双一：《“白色恐怖”受难者黄藻如在台湾的创作》，《台湾研究集刊》，2018年第1期。黄藻如（1909-1957），1947年迁台，笔名有“不惑”、“白琅”、“藻”、“将军”、“无咎”、“赤羽”、“萍如”等。“黄藻如”同“黄藻儒”，本文以“黄藻如”代指。2019年，余巧英主编《黄藻如文存》收入黄藻如在台湾创作的诗歌、杂文、小说等作品逾180篇，理清了黄藻如在光复初期台湾发表的作品，具有史料价值，推进了此文艺副刊作者身份的考订与研究。

(14) 余巧英：《语言转换、文化重建与两岸文学汇流：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研究（1945-1949）》，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文学所，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

上述研究为本文的展开,提供了较多有益的思考。《公论报》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半年后创刊,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台湾光复伊始各类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繁盛局面,作为台湾公共舆论平台的《公论报》形成了一个介于两岸、公私、官民之间的民主的对话平台。本文将以厦门大学图书馆馆藏和台湾“国图”馆藏的《公论报》⁽¹⁵⁾中创刊较早的艺文副刊“日月潭”和“游艺”为研究对象,分析《公论报》在1947-1949年间台湾文艺重建工作中的重要角色,探讨《公论报》对上海《大公报》思想资源的借鉴,对《新生报》“除旧”与“布新”的承继,并与《新生报》“桥”副刊同时构成光复初期台湾文化建设的重要舆论平台,也是两岸知识分子合力耕耘的文艺园地。在赓续“五四”精神方面,《公论报》作家群坚守重建民族文化的职责,倡导发扬“五四”人文精神,发挥文艺社会效用等主张。

一、从上海《大公报》到台湾《公论报》:连接两岸文化的重要窗口

台湾光复后,台湾与上海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互动。1948年,“上海各大报,在台北均设有办事处”⁽¹⁶⁾。同年4月11日,“日月潭”副刊刊载新闻,盛赞《大公报》:“内容丰富,立论公正,销遍国内,誉满世界,是真正读者的理想报纸。”⁽¹⁷⁾《公论报》高度评价《大公报》在国内外报界享负盛名,并指出台北市台湾分馆开放订阅台湾航空版《大公报》。这绝非普通的报刊广告,我们从“日月潭”副刊栏常可以看到对上海《大公报》相关文章的延伸讨论。光复初期,台北《公论报》与上海《大公报》联系密切,在两岸作家之间搭建了互通的桥梁。

(一) 台北《公论报》与上海《大公报》跨越海峡的人缘与文缘

1938年,李万居在香港经宋斐如介绍认识时任《大公报》编辑的李纯

(15) 厦门大学所藏《公论报》原始报刊,计有1948年5月、9月、11月,1949年1-9月、11月,其中部分报刊有缺漏。根据笔者查阅,部分报刊期数相同,内容不同,且同等内容的情况下厦门大学馆藏版本比台湾图书馆馆藏刊物期数早一期。本文遵循原始报刊中标明的期数。

(16) 林紫贵:《台湾的文化运动——台胞每卅人即拥有一份报纸方土戏剧仍带有祖国旧风》,《中华时报》1948年3月5日。

(17) 新闻,《公论报》,“日月潭”第140期,1948年4月11日,第6版。

青⁽¹⁸⁾，此后两人文化互动较多。在主要编辑和作者群方面，《公论报》的创刊者及栏目主编多有在《大公报》任职的经历，如李纯青、杜文思、郑士镛等人有在上海、重庆或香港等地《大公报》的任职经验，为其在台湾办《公论报》提供了借鉴。例如，杜文思1947年到台湾任《公论报》总编辑，1949年又转到香港《大公报》任职，他曾四进四出《大公报》。其次，两岸三地相互介绍文化活动，在文学论述上也具有关联性。例如，黄荣灿曾在《公论报》“日月潭”和“游艺”副刊介绍大陆地区的木刻作品，“也在上海的《大公报》《文汇报》推荐描写台湾的作品。”⁽¹⁹⁾1948年2月24日，方蒙在《大公报》发表《小记许寿裳先生》⁽²⁰⁾介绍许寿裳与鲁迅的交往甚密，光复初期许寿裳应陈仪邀请赴台，并在台湾介绍鲁迅思想。此外，《大公报》在台记者也关注《公论报》的相关讯息，如：新闻记者庆澍寄稿《带笔的人与带枪的人——台湾拾零之二》⁽²¹⁾，通过描述《公论报》记者麦飞因在火车旅途中速写《车厢人物》而遭到警察的谩骂、查证和禁闭事件，诘问道：“带枪的人对带笔的人，是这样永远‘误会’下去么？”《公论报》作为民营报刊，秉持严谨和公正的态度，为人民发声的行为，得到卜幼夫、王鼎钧等作家的肯定，具有“台湾大公报”⁽²²⁾的美誉。另一方面，《公论报》和《大公报》之间的关联也可影射出光复初期台北通过上海“作为观察中国政治与社会，吸纳思想，认同文化身份的重要对象”⁽²³⁾之现象。例如，徐訏曾以“东方既白”

(18) 李纯青 (1908-1990)，台北人，祖籍福建安溪，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要领导者之一，著名政论家、报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加入《大公报》，主要关注日本与军事等问题。1941年由香港转重庆《大公报》。1945年10月25日，以重庆《大公报》记者身份参与日本投降仪式。1938-1949年间曾在香港、重庆、上海、天津《大公报》以及天津《进步日报》工作。“原先李万居属意李纯青担任《台湾风土》副刊主编，可惜李纯青决定留在上海担任高职位的资深编辑”。引自刘韦廷：《陈奇祿与〈台湾风土〉副刊——战后（1948-1955）台湾本土民俗知识出现与延续》，《成大历史学报》，第52号，2017年6月，第143页。

(19) 黄俭红：《追忆在台湾推广新木刻艺术运动的木刻家黄荣灿先生》，收录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2012年春》，北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25页。

(20) 方蒙：《小记许寿裳先生》，《大公报》（上海版），1948年2月24日，第5版。

(21) 庆澍：《带笔的人与带枪的人——台湾拾零之二》，《大公报》（香港版），1948年6月9日，第7版。

(22) 杨锦麟：《李万居评传》，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页。佟建寅主编：《台湾历史辞典》，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年，第93页。王鼎钧：《文学江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103页。

(23) 黎湘萍：《战后“双城记”——光复初期上海与台北的文化政治》，《东方文化》第5期，第53页。

笔名，在《有感于“牵一发而动全身”》《向上海看齐？》⁽²⁴⁾等文章中，指出“上海”对“台湾”地区的直接影响。台湾光复后各行各业都向祖国第一大都市看齐，呈现出“台北上海化”的特别现象。不过，作者从上海市场波动直接牵引台湾物价的上涨这一时弊出发，提出“麻木瘫痪半身不遂”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统一论，讽刺官场的贪污行径以及台北作为台湾省会城市，不应成为上海的“尾巴”。他寄希望于台北立足现状学习上海，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形成一套适合台湾地区的标准。

（二）在关注时政议题方面，两报接力关注“和比战难”等相关讨论

《公论报》常见引用《大公报》刊载文章的题名、论述或口号，如《“好吃痛打”》⁽²⁵⁾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²⁶⁾等等。尤其是，就胡适及其“自由”、“和比战难”等言论方面，“日月潭”副刊曾多次发表评论。例如《“做大事”与“做大官”》⁽²⁷⁾指出，故乡安徽绩溪对胡适早年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和文化革命成就置若罔闻，反而因胡适移任驻美大使转变态度，认为其“名垂不朽”。作者以此来指称国民党官员应以民为本，为民求益。1948年10月5日，胡适在汉口演讲《自由主义与中国》。关于“自由”，胡适认为，“自由以不妨碍他人自由为原则。”⁽²⁸⁾对此，黄藻如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富有“自由”，而贫民没有，所以胡适的言论忽略了“自由的基础是平等的”这一现实问题。不仅如此，1948年11月20日，胡适在演讲时分析国内外形势，提出“和比战要难千倍万倍”⁽²⁹⁾之论断。特别是，1949年初蒋介石提出和谈后，同年3月22日，胡适在台回应记者，称“和比战难上千百倍”⁽³⁰⁾，颇有“主战意识”，

(24) 徐訏，亦称徐吁，署名“东方既白”：《有感于“牵一发而动全身”》，《公论报》，“日月潭”第185期，1948年7月2日，第4版。《向上海看齐？》，《公论报》，“日月潭”第209期，1948年8月28日，第4版。

(25) 署名赤羽：《“好吃痛打”》，《公论报》，“日月潭”第313期，1949年2月23日，第6版。

(26) 陈忠纯：《内战时期台湾〈公论报〉的“左倾”思想言论析论——以对和战的评论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1期，第66页。1949年《公论报》援引《和谈下月开始》，《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3月27日。

(27) 署名绿叶：《“做大事”与“做大官”》，《公论报》，“日月潭”第4期，1947年10月29日，第4版。

(28) 署名白琅：《杂谈自由》，《公论报》，“日月潭”第242期，1948年10月22日，第6版。《胡适释自由昨在武昌讲演》，《大公报》，1948年10月6日，第1版。

(29) 《胡适在平演讲认为和比战难》，《大公报》（上海版），1948年11月21日，第2版。

(30) 《胡适抵台湾仍说和比战难》，《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3月23日，第1版。

引发了社会舆论批判。例如,《公论报》刊载多篇文章:《论“我们的朋友”——做了过河卒子,只好拼命向前》《惑然、愤然而又惘然!》《自由》⁽³¹⁾,对胡适的“主战”观提出批评。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49年2月17日,陈耀寰就以“姚驰原”为笔名在《闲谈胡适》一文中,论及胡适早曾以“父亲作吏台东,极愿旧地重游”,展露其过海峡之心,在“和”与“战”相互较量的社会呼声中,预见胡适又作“过河卒子”⁽³²⁾。相应的,《大公报》曾刊登《过河卒色厉内荏》《过河卒将泛海》⁽³³⁾等新闻指称胡适的消极状态。更有读者致函公开信,对胡适的“和比战难”之说表示惊诧和惋惜,指责胡适完全是出于个人安全和安乐才发此言论。他认为,“在人民的立场上只要是和平,易与不易不是人民的问题”⁽³⁴⁾,希望胡适为大多数人民服务,不要做名不符实的自由主义者,做大多数人民的“卒子”。光复初期,两岸报人之间共评、互评、互动、互引之现象司空见惯,“日月潭”副刊的文章《谈及其他》《宽大的限度》《介绍<新路>(创刊号)北平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发行》《焚烧佳话》《不算一回事?》《由“隐民”想起》《小事》《劝世迷信——“立此存照”之二》《“优生”新发现——忙中闲话之十三》《领薪委员》《一天中的新闻集锦》中都可看见《大公报》的身影。⁽³⁵⁾特别是,在涉及民众利益的问题

(31) 署名年青:《论“我们的朋友”——做了过河卒子,只好拼命向前》,《公论报》,“日月潭”第288期,1949年1月18日,第6版。署名无咎:《惑然、愤然而又惘然!》,《公论报》,“日月潭”第329期,1949年3月29日,第6版。署名胡迪:《自由》,《公论报》,“日月潭”第339期,1949年4月20日,第6版。

(32) 署名姚驰原:《闲谈胡适》,《公论报》,“日月潭”第309期,1949年2月17日,第6版。陈耀寰(1922-),广东兴宁人,1945年由浙大毕业后,陆续为《民主周刊》《新华日报》《大公报》(上海、香港)等杂志撰稿。

(33) 《过河卒色厉内荏》,《大公报》(香港版),1949年3月1日,第1版。1949年3月13日,《过河卒将泛海》,《大公报》(香港版),1949年3月13日,第7版。

(34) 《向南飞只为安全刘不同嘲笑胡适》,《大公报》(香港版),1949年1月9日,第1版。

(35) 署名川东:《谈及其他》,《公论报》“日月潭”第157期,1948年5月2日,第4版。署名姚驰原:《宽大的限度》,《公论报》,“日月潭”第178期,1948年6月13日,第4版。署名青果:《介绍<新路>(创刊号)北平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发行》,《公论报》,“日月潭”第180期,1948年6月19日,第4版。署名东方既白:《焚烧佳话》,《公论报》,“日月潭”第200期,1948年8月8日,第4版。署名易逊:《不算一回事?》,《公论报》,“日月潭”第221期,1948年9月21日,第6版。署名胡迪:《由“隐民”想起》,《公论报》,“日月潭”第223期,1948年9月23日,第6版。署名胡迪:《小事》,《公论报》,“日月潭”第243期,1948年10月23日,第6版。署名姚驰原:《劝世迷信——“立此存照”之二》,《公论报》,“日月潭”第248期,1948年11月5日,第6版。署名易逊:《“优生”新发现——忙中闲话之十三》,《公论报》,“日月潭”第278期,1948年12月29日,第4版。署名赤羽:《领薪委员》,《公论报》,“日月潭”第326期,1949年3月23日,第4版。署名赤羽:《一天中的新闻集锦》,《公论报》,“日月潭”第331期,1949年

方面,《公论报》与《大公报》秉持相似的立场。

(三) 借鉴《大公报》等报刊的思想资源,来分析光复初期台湾诸议题

1947年4月16日,署名“姚驰原”在《世界新潮》发表《在台湾,看民变!》以自身经历为基础还原台湾“二二八事件”的演变状况,较早地梳理这场民变的来龙去脉,认为光复后国民党接续日据台湾总督府专卖局专卖模式,查缉私烟只不过是导火索,“民变”的发生完全是“全省人民对一年余来之腐败政治的不满”。事实上自台湾光复以来,“大小贪污相互抢夺接收敌产者到处有之。弄文舞法或倚借武力以欺压人民者比比皆是。人群不能得到保障,言论出版失去自由,财政破产,物价继续腾贵,厂矿倒闭,农村日益衰微,失业者成群,无法营生者不可胜算……此事件根本是由腐败政治之结果而来”,“抗战胜利后名义上台省同胞已从日本帝国主义者手里解放出来,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处处受桎梏,一切还是统制,甚至统制得更严。”⁽³⁶⁾“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进入“戒严状态”,实行军事化管理,封闭报馆,据该文称,“台北原有的二八九家报纸,现在只存‘新生报’一家。”作者认为,台湾并不如大陆人士遥想一般和平安定,反而由于缺乏正确的组织和领导,……而台湾民众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不仅如此,陈耀寰还曾引上海《大公报》经济版“劝世文”全文,作《劝世迷信“立此存照”之二》:“大公报,可也算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报了,近来翻来翻去,也十分不过瘾……十月廿七日的上海大公报经济版,有一篇堪称佳作的劝世文……”⁽³⁷⁾,该文讽刺国民党官僚体系腐败,不顾民生等问题,即便是上海通货膨胀极其严重的状况下,国民党仍然实行金圆券改革措施,导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作者心目中,“新式乡下佬”在台湾早就出现,他们并不是乡下人,也没有乡下人淳朴、忠厚的特质。“新式乡下佬”官僚气息浓厚,他们迷恋三色冰淇淋和啤酒,崇洋媚外、只顾享乐,不为民生,这显然是“国民党”的特指,作者批判称:“你们来自乡下,你可会为乡下人做些什么?”⁽³⁸⁾讽刺国

4月1日,第6版。

(36) 1947年4月16日,陈耀寰曾以“姚驰原”为名在《世界新潮》第2卷3期,第24-27页发表《在台湾,看民变!》。

(37) 署名姚驰原:《劝世迷信“立此存照”之二》,《公论报》,“日月潭”第248期,1948年11月5日,第4版。

(38) 署名姚驰原:《闲话乡下佬》,《公论报》,“日月潭”第222期,1948年9月22日,第6版。

民党高官忘本、自私。

又如《大公报》特辟的“大公园”栏目中不时刊载小小说。1949年5月17日，发表在“日月潭”中署名“易逊”的《漫谈“小小说”》一文援引4月21日载于《大公报》中署名“桑漆先生”的《论小小说》，介绍该文体特征：“（一）有一件相当尖锐性，强有力的主题。（二）人物性格的突出（三）语言的简练生动等外：又说‘小小说’的作者可以掘发生活，批评人物，鼓励新的生机，而读者也可以掘发生活，获得教育，克服并生长起来，形式虽少，而力量确是强大的。”⁽³⁹⁾因小小说短小、精湛且有力，小小说所肩负有“从群众中来表现群众的生活，群众的力量”，所以作者希望早日将这种表现形式移植到台湾的文坛中，发挥其短小、快速、直达批判目标的作用。

该栏时常援引外省文稿、报导两岸文艺交流消息或文章，或针砭时事发表见解，或介绍祖国文艺，如：1949年8月11日，“日月潭”副刊的“小邮筒”中：“一、日月潭园地公开欢迎外稿。凡散文、诗歌、译文、杂文、随笔、笔记掌故、传记、小说、游记、人物素描、文艺理论等，均特别欢迎。……三、本刊拟开辟红楼梦专号及文艺理论研究专号，欢迎读者踊跃赐稿”⁽⁴⁰⁾，“本省读者不必过分享怕对祖国文字运用不纯熟，只要内容充实，文字没有关系”⁽⁴¹⁾，以及针对上海《大公报》资讯创作的《文物出洋》⁽⁴²⁾等等。

二、从《新生报》到《公论报》：延续“除旧”与“布新”的使命

在“二二八事件”期间，《新生报》社长李万居因“半山”身份在当时处境艰难。1947年9月，李万居从《新生报》辞职。10月25日，创刊《公论报》，并担任社长一职，继续实现公论时弊的理想。《新生报》编辑倪师坛等人也纷纷响应。曾任《新生报》“文艺”副刊主编的何欣⁽⁴³⁾也在之后担任1949

(39) 署名易逊：《漫谈“小小说”》，《公论报》，“日月潭”第349期，1949年5月17日，第6版。

(40) “小邮筒”，《公论报》，“日月潭”第380期，1949年8月11日，第6版。“日月潭”第430期是“文艺理论专号”，1949年11月16日。按照此期《编者后记》，次日第431期是“诗专号”。

(41) 陈明成：《秘境与弃儿——初步踏查〈公论报〉文艺副刊》，《台湾文学研究》，第7期，2014年12月，第104页。

(42) 署名新生：《文物出洋》，《公论报》，“日月潭”第304期，1949年2月11日，第6版。其中就1949年1月28日《大公报》“围殴过极名贵文物八千六百件将自沪运往美国”报道针砭时势。

(43) 何欣，文学评论家，父亲何容。1947年5月4日至1947年7月30日，担任《新生报》“文艺”

年4月11日创办的《公论报》“文艺周刊”主编。《新生报》创设初期就秉持以中国为本位的思想，具有三个重要任务：“第一、介绍祖国文化；第二，传达及说明政府法令；第三，做台湾人民的喉舌。”⁽⁴⁴⁾《公论报》摒弃了《新生报》为执政当局服务的想法，却延续了其“除旧”与“布新”的使命。

（一）清除旧思想，促进两岸文化融合

1947年5月4日，何欣在《新生报》“文艺”副刊创刊词中指出，台湾不仅重归祖国，台湾的文艺和思想也面临着类似“五四时代”的巨变，“在思想上，要清除法西斯的余毒，吸收进步的民主思想，同祖国的文化合流，这是新的革命，从世界各国的文艺思想发达史上看，每逢一个崭新的改变期，就是文学的蓬勃发展期。我们断定，台湾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崭新的文化运动，那就是：清扫日本思想余毒，吸收祖国的新文化，在这新文化运动中，台湾也会发生新的文学运动。”⁽⁴⁵⁾《公论报》也曾围绕光复初期台湾文学与祖国文化问题进行探讨。如台籍人士金圣泣从台湾人无购书、读书这一现象出发，认为“内地移植来的文化在台湾现状下不能生根”，而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是现实生活不够安定。他反观日据时期称，“日本统治时代，为了奴化台湾同胞，文化是受迫害的，但物质生活却又是安定的，所以除了思想生活和文化活动外，其他的物质的建设，科学的进步，煞是生根的……但到了现在，奴化政策虽跟日本统治同时结束，思想生活和文化活动却又因受了现实生活的不安定的威胁，阻碍了发展。”⁽⁴⁶⁾他认为，当下大陆地区个人的文艺成就较高，所以派大陆个人成就较高的一流学者到台湾交流即可产生效力。对此言论，周匀持批判意见，在《〈生根问题〉读后……请教于金圣泣先生》⁽⁴⁷⁾一文中指出，文化“生根”十分重要，但是日本以武力统治台

周刊主编，共发行13期。后担任《公论报》“文艺”周刊主编。“文艺”周刊主要介绍中西文学理论、欧美近代著作以及翻译作品。

(44) 黎湘萍：《台湾光复初期公共领域的建立与文学的位置：1945-1949》，《华文文学》，2013年第1期，第85页。

(45) 编者：《迎艺术节》，《新生报》，“文艺”第1期，1947年5月4日，第5版。

(46) 金圣泣：《打开问题的“钥匙”——文化短论之三》，《公论报》，“日月潭”第139期，1948年4月10日，第6版。金圣泣：《生根的问题——文化短论之四》，《公论报》，“日月潭”第140期，1948年4月11日，第6版。

(47) 周匀：《〈生根问题〉读后……请教于金圣泣先生》，《公论报》，“日月潭”第148期，1948年4月20日，第4版。

湾，最终也无法获得台湾人的民心。日据时期，日人确实在应用技术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带来了些许的成就，但是日本人的武士道、文学、“皇道”等思想文化都没有在台“生根”。周匀指出，“生根”一语隐含的逻辑是“台湾文化已经被日本化或成为异族文化”，具有“殖民”色彩，故不可妄言。此外，台湾是一个以闽、粤为祖先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为汉民族的社会，所以，大陆同胞带来的文化和日本的异民族文化不可同日而语。作者认为，金先生强调了阻碍两岸文化轨道合并的重要因素，如：语言隔阂、文字生疏、环境陌生等，却忽略了“大陆地区文化和台湾地区文化之间各自为政”的决定性原因和现实，即“外、本省同胞的经济政治生活，形成两个世界，而不能合拢”的问题本质。虽然双方在对日本殖民文化的表述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两者都指出稳定和平等一致的社会环境是弥补两岸“心理上”和“人事上”差异的基础，也是文化交流和互通的重要条件。“日月潭”副刊延续了《新生报》“文艺”副刊清除法西斯思想、和祖国文化汇流的任务，指出文化是消除台湾人和大陆各省之间心理鸿沟的唯一钥匙，也是解决当下社会省籍矛盾等现实问题的关键。

(二) 介绍祖国文艺，促进了解互鉴

光复初期，两岸以报纸为媒介展开的文学、文化交流司空见惯，例如上海《新文学》杂志对台湾文学的介绍，《台湾文化》《新生报》引介大陆文艺思想并加以探讨。从“日月潭”副刊刊载的《新瓶装旧酒》《推介〈胜利以后〉——许杰著·黄河书店版》《介绍〈新路〉（创刊号）北平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发行》⁽⁴⁸⁾等文章中可以发现，《公论报》密切关注大陆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特别是对文艺界了如指掌，如：他们指责书店打着著名作家的幌子，利用鲁迅、巴金、茅盾、老舍、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丁玲、沈从文、叶绍钧、郑振铎、田汉、林语堂、徐志摩、沙汀、萧军、鲁彦、冰心、庐隐，谢冰莹、谢绿绮等人名声，不顾质量，谋取利益。何欣在担任《新生报》“文艺”副刊编辑时曾指出，在光复初期台湾新文化建设中，文学是有力的武器，介绍祖国新文学也是时下刻不容缓的要务。但是，《新

(48) 署名更凡：《新瓶装旧酒》，《公论报》，“日月潭”第108期，1948年2月28日，第4版。青果：《介绍〈新路〉（创刊号）北平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发行》，《公论报》，“日月潭”第180期，1948年6月19日，第4版。署名焦煤：《推介〈胜利以后〉——许杰著·黄河书店版》，《公论报》，“日月潭”第27期，1947年11月20日，第4版。

生报》“文艺”副刊主要刊登的是外国翻译作品，也因此遭到过读者的不满。何欣辞任《新生报》“文艺”副刊编辑后，曾以“禾辛”为笔名，在“日月潭”副刊第78、79、80、82期中分别刊载《老舍先生》《<郁雷>作者朱彤先生》《恶魔诗人于赓虞先生》《胡风先生》⁽⁴⁹⁾，介绍生活严肃、规律，作品风趣横溢的老舍先生，从传说中发现书写材料、呼喊“性灵解放”、描写现实的朱彤先生，热爱鲁迅的赓虞先生，以及继承鲁迅精神、为中国新文艺而努力的胡风先生。在刊物方面，“日月潭”副刊密切关注祖国动态，及时报道台湾文学和大陆文化之间的交流状态。例如，1947年11月14日，“青果”在“日月潭”副刊提前介绍了11月15日由范泉主编、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的《文艺春秋》“边疆文艺特辑”。“边疆文艺特辑”收录了三篇以边疆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分别是：张钧的《哈萨克的叛徒》、王鲁雨的《马宜浪》以及欧坦生的《沉醉》。以上小说的创作者都有深入边疆、体验边疆民间生活的经验，具备边疆文艺创作的先决条件。特别是，欧坦生在范泉指导下改写的《沉醉》，是以台湾为背景，描写大陆赴台的大小官员们欺骗、玩弄、侮辱台湾少女，是最早以“二二八事件”为题材的小说。作者“青果”评价道：“台湾自光复以来，国内刊出小说以台湾生活为题材者，以我所知似还没有过，而《沉醉》中所揭示的现象，复为今日本省中最值得注意的问题，希望读者们对本文不要忽略了它。”⁽⁵⁰⁾此外，据该文介绍，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第4卷4期也曾收录了黎烈文的《伊尔的美神》一文，此“边疆文艺特辑”中收录了黎烈文的论文《海里美评传》。虽命名为“边疆文艺特辑”，并不仅仅刊登边疆文艺，也发表译作等。正当副刊编辑发排此书评时，还收到黎烈文专门为《公论报》翻译的法国梅里美的著名短篇小说《奇遇》文稿，并将其连载于“日月潭”第22至28期。由此可见，“日月潭”副刊不仅与大陆文艺界有共通的创作群体，还时刻关注祖国文艺的进展，是光复初期两岸文艺界沟通的重要桥梁。

(49) 署名禾辛：《老舍先生》，《公论报》，“日月潭”第78期，1948年1月24日，第4版。《<郁雷>作者朱彤先生》，《公论报》，“日月潭”第79期，1948年1月25日，第4版。《恶魔诗人于赓虞先生》，《公论报》，“日月潭”第80期，1948年1月26日，第4版。《胡风先生》，《公论报》，“日月潭”第82期，1948年1月29日，第4版。

(50) 署名青果：《介绍十一月号“文艺春秋”——范泉编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公论报》，“日月潭”第21期，1947年11月14日，第4版。

(三) 关注中国前途，做台湾民众的喉舌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公论报》中的作家团体定位《新生报》为国民党的“官方报”，相关言论具有讽刺之意。例如，《无谓的争执》⁽⁵¹⁾一文指出《新生报》成为田汉和林维中夫妇之间的论争的传声筒。易逊和姚驰原都纷纷为《新生报》悬挂“唯一的权威的官方报”头衔，指出该报刊已经成为市政府布告闲杂事等的有效工具。⁽⁵²⁾《公论报》是“至国民党迁台前已成为台湾地区可以与《新生报》分庭抗礼的报纸”⁽⁵³⁾，在台湾社会舆论中享有颇高地位，其关注最多的部分是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和弊端。例如，1948年6月15日，《新路周刊》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发行。《新路周刊》中有专论、文艺、通讯、书评以及当时国内杂志中少见的“辩论”栏目。同月19日，“日月潭”副刊介绍此刊，称“在该刊发刊词中，编者说：‘在万方多难的今日，我们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发行本刊，想以大家的智慧，来探索中国的前途。’而对中国前途的去向，本期附录中有他们的三十二条主张，举凡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各问题均逐项提到。编者说明这三十二条主张，并不是什么党纲，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根本不是一个政党的组织，只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一个公民，对于国家大事中的每一个问题，自然有我们的看法，把这种看法公开的说出来，是做公民的义务，也是做公民的权利。’”⁽⁵⁴⁾编者认为，该刊物仅有二十四面，但内容都有扎实的理论 and 现实依据，文字深入人心。《公论报》自创刊起，始终以“民间报”自居，向读者约稿⁽⁵⁵⁾。其创作团体也和《新路周刊》一样，从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角度出发，秉持“作家作品为社会负责”⁽⁵⁶⁾的态度，成为民众的发声口。例如，《台

(51) 署名易逊：《无谓的争执》，《公论报》，“日月潭”第103期，1948年2月22日，第4版。

(52) 署名姚驰原：《心惊肉跳——“立此存照”之一》，《公论报》，“日月潭”第240期，1948年10月20日，第6版。署名易逊：《借花献佛——忙中闲话之八》，《公论报》，“日月潭”第252期，1948年1月11日，第6版。

(53) 陈忠纯：《内战时期台湾〈公论报〉的“左倾”思想言论析论——以对和战的评论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1期，第65页。

(54) 署名青果：《介绍〈新路〉（创刊号）北平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发行》，《公论报》，“日月潭”第180期，1948年6月19日，第4版。

(55) 署名沧溟：《艺术与生命》，《公论报》，“日月潭”第247期，1948年11月4日，第4版。

(56) 见夏之中和徐孔述的相互论述。夏之中：《谈“不满”的注脚》，《公论报》，“日月潭”第26期，1947年11月19日，第4版。回应11月13日《公论报》20期徐孔述先生发表的十条座右铭（空窗），其中“不满就是没有自信这是意志的弱点”和“满足是好食和贪睡者的一个温暖的猪栏”。夏认为：“‘不满’的注脚应该是‘不满是求改进的动机，改进是不满的结果’”。徐孔述：《答致夏之中君》，《公论报》，“日月潭”第30期，1947年11月23日，第4版。夏之中：《与徐孔述

币——向马凡陀学习》《一个建议》《改革台湾度量衡——读柳培潜先生大作想起》《忙中闲话（五）》《三光先生传（仿五柳先生传体）》《扑灭蓝色恐怖》《海上寄语》《绝望与希望——看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后》⁽⁵⁷⁾等文批判国民党进行的金圆券币制改革和“八·一九”限价举措导致物价哄涨、民不聊生，普通百姓沦落成为“光头、光棍、光钱袋”的“三光先生”，在死亡线上奄奄一息。又如，《谈解决油荒》《也算民意》《也谈节俭》《从戒烟谈节约》《所谓代表民意》《如此节约》⁽⁵⁸⁾等指责官员不思民生，忽视阶级和贫富差距，发动“节约运动”，颠倒“点灯”与“放火”的主次位置，造成“节约只施于小民而不行于大官”的现状。作家们批驳国民党官员空谈政治，甚至点名“节约”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举措，更是批判“博览会”外强中干的虚假营宣。值得一提的是，在面对中外摩擦时，“日月潭”副刊多转变焦点，从中华民族立场出发，呈现出共同抵抗外民族欺辱的国族意识。早在日据时期，李万居就曾在《台湾民报》和《时事类编》等刊物中发表多篇译作或论述⁽⁵⁹⁾，引介西方文艺思潮，并且表露出浓厚的厌日抗战情绪。台湾光复后，

先生再谈“满足”与“不满”，《公论报》，“日月潭”第36期，1947年11月29日，第4版。

(57) 署名姚驰原：《台币——向马凡陀学习》，《公论报》，“日月潭”第208期，1948年8月27日，第4版。署名胡迪：《一个建议》，《公论报》，“日月潭”第209期，1948年8月28日，第4版。署名东方既白：《改革台湾度量衡——读柳培潜先生大作想起》，《公论报》，“日月潭”第224期，1948年9月24日，第6版。署名易逸：《忙中闲话（五）》，《公论报》，“日月潭”第224期，1948年9月24日，第6版。王成：《三光先生传（仿五柳先生传体）》，《公论报》，“日月潭”第211期，1948年9月3日，第6版。署名东方既白：《扑灭蓝色恐怖》，《公论报》，“日月潭”第211期，1948年9月3日，第6版。黄嘉音：《海上寄语》，《公论报》，“日月潭”第214期，1948年9月9日，第6版。不惑：《绝望与希望——看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后》，《公论报》，“日月潭”第234期，1948年10月9日，第6版。

(58) 署名柯林：《谈解决油荒》，《公论报》，“日月潭”第60期，1948年1月5日，第4版。麦芳嫻：《也算民意》，《公论报》，“日月潭”第91期，1948年2月7日，第4版。署名胡迪：《也谈节俭》，《公论报》，“日月潭”第235期，1948年10月10日，第6版。署名白的：《从戒烟谈节约》，《公论报》，“日月潭”第231期，1948年10月6日，第6版。署名东方既白：《所谓代表民意》，《公论报》，“日月潭”第228期，1948年10月1日，第6版。陈昌如：《如此节约》，《公论报》，“日月潭”第94期，1948年2月12日，第4版。

(59) 李万居曾在《台湾民报》中发表过两篇翻译作品：其一，李万居翻译的左拉作品《蛇蛋果》刊载于1928年2月26日的第197号。其二，李万居翻译的Bernardin de Saint-Pierre的《保罗和维基妮》刊载于1928年3月4日的第198号。1926年李万居赴法国留学1932年返台，由此推断这两篇作品应该都是其在法国期间翻译的。1935年《时事类编》半月刊（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并出版，出版地：上海、南京、重庆）第7期中刊载李万居翻译P.Saisset E.Znosho-Borovgky创作的《西洋的戏剧于教育》，译者注：“本文分上下则篇，上篇叙述美英德俄比等国教育戏剧运动的过程以及戏剧对于儿童关系之重要，下篇则单独讨论法国戏剧与教育运动的情形以及该国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等等。此文类可供我国教育界和戏剧界的借镜，特介绍给关

李万居仍对“国际托管”等分裂言论持警惕态度，并在《公论报》社论强调台湾人民倾心祖国的意愿。他认为“日本人据台五十年，表面上，台湾免不了遗留许多日本人的影响，但台湾的居民百分之九十八是汉人，他们的祖先移居台湾时所带来的开疆辟土、坚韧不拔的精神，正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台湾、澎湖都应该重新并入中国领土……台湾实际并没有被同化，他们的民族意识现在仍然栩栩地活着，他们所具有的汉民族优良传统始终保持着。”⁽⁶⁰⁾又如，1948年，国民党为稳定物价，派宋庆龄到美国寻求援助。对此，麦芳娴⁽⁶¹⁾指出，台湾人不希望向美国求援，更不希望多来一些美国士兵，甚至台湾某学校墙壁上贴出：“台湾青年团结起来，反对美军在台湾建立海军根据地”等标语。光复初期，台湾民众对回归祖国抱持很高的期待，他们希望国民党可以脚踏实地建设台湾，而不是一再让台湾同胞失去期待。“日月潭”副刊始终强烈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人民权益。例如，1948年初，英国军警强拆九龙城内的中国人居民住房，并且采取毒瓦斯、逮捕、屠杀等手段对待中国同胞。对此问题，《忍耐的限度》一文中称，“九龙是中国的领土，他们都是中国的同胞”⁽⁶²⁾，中国人住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不应受到英国的干涉，更遑论屠杀。作者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表示，“九龙事件”是二战胜利后对中国人的一个重要考验，负责交涉此事件的官员郭德华⁽⁶³⁾不作为，但是人民已经无法忍耐了。综上可见，“二二八事件”之后，《公论报》不同于《新生报》为国民党当局服务的报刊性质，持续为民发声。在文艺方面，“日月潭”副刊也延续了《新生报》“文艺”副刊清除殖民文化影响和介绍祖国文艺的目标，致力于通过文化交流来消弥两岸人民之间的心理鸿沟，是台湾民众及时了解祖国动态重要窗口，也为两岸作家发表对现实问题的不同看法提供了沟通园地。但是，在面对新的世界局势时，在台文化工作者希望国人

心此项运动的人。”1938年12月15-16日李万居在《申报·自由谈》中发表《日本国民的厌战情绪》一文认为“日本军法怎样横暴，用么‘精神总动员’，仍不能压制其国内内心的厌战的思想呀！战时延长，这些作品更会滋长增加的。现地，日本国民已由‘厌战’渐渐进入‘怨战’的阶段，再下去就是‘反战’，到那时候，日本军阀的末日便降临了。”参见李万居著，许俊雅编：《李万居译文集》，台北市：万卷楼，2012年，第221页、第309页。

(60) 张飞：《〈台湾风土〉与战后初期台湾的台湾史研究》，厦门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9、10页。

(61) 麦芳娴：《这也算是新闻吗？》，《公论报》，“日月潭”第79期，1948年1月25日，第4版。

(62) 万柳州：《忍耐的限度》，《公论报》，“日月潭”第77期，1948年1月23日，第4版。

(63) 邱雪森：《散文家生存之道——桥边杂谈之一》，《公论报》，“日月潭”第80期，1948年1月26日，第4版。

强而有力，中华民族能在世界上受到尊重并占有一席之地。

三、赓续“五四”精神：台湾文艺的在地化传播

台湾光复后，“五四”文化成为文化重建工作中的重要思想来源，台湾文坛高举“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提倡为人民而艺术。李万居担任《新生报》发行人及社长一职期间，该报多次纪念“五四”运动，如许寿裳发表《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认为“我想我们台湾也需要有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肃清，同时提倡民主，发扬科学，于五四时代的运动目标以外，还要提倡实践道德，发扬民族主义。”⁽⁶⁴⁾重建台湾文坛需要扫除日本文化的遗毒，重塑国民性，完成“五四”所赋予的时代任务。1947年8月1日，在李万居辞职《新生报》前，史习枚创设了《新生报》“桥”副刊。1947年末，《桥》副刊围绕“台湾新文学建设”问题展开历时一年有余的论争。同期，《公论报》也对此论争中的焦点“五四是否适应当今社会”等问题展开了论述，体现了副刊“日月潭”“游艺”和“桥”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文人们共同关注的时代话题。

（一）《“五四”述感》与爱国、民主与科学

正值“桥”副刊论战末期，《公论报》在创刊后迎来了第一个“五四”纪念日。1948年5月4日，《公论报》在“社论”栏目刊登《“五四”述感》⁽⁶⁵⁾，该文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九周年而写作，文中认为，虽然“五四”已经过了近30年，但是“五四”精神在当时台湾仍具有继续发扬的深重意义。“我们深知科学的重要，我们祈求着民主的实现，这正与‘五四’所追求的目标一致；但是我们的物质科学不发达，科学精神未发扬，而我们行起宪政来，如这次国大开会，亦复怪现象百出，备见国人民主政治素养之不足，这便不能不令人深以‘五四’精神之未得继续发扬为憾。科学与民主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互相贯连的两个主潮；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没有发扬，国人的思想，意识便没有经过根本的改造，而离开了五四运动所欲建立的新文化的完

(64) 许寿裳：《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新生报》，1947年5月4日。见黄英哲：《战后台湾文化重建》，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7页。

(65) 《“五四”述感》，“社论”，《公论报》，1948年5月4日，第2版。

整内容，科学与民主亦成了各自孤立的东西，如此而希望两者有令人满意的发展，安有可能。”⁽⁶⁶⁾虽然当时有学者诟病“五四”的性质为文化运动，不能奢求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结合，为社会进步所服务。但是作者认为，我们并不惋惜“五四”运动本身的遭遇，而是“五四”新文化中的“科学”与“民主”精神未得到持续充分的发扬，国民意识也没有得到改进。“‘五四’有了辉煌的开端和正确的目标，倘使继续发展，改革不难针对整体，而移植来的文化，也不难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问题是‘五四’久久被人冷落了。这一运动本身的遭遇不足计，但我们社会的进步也随之停滞则殊堪惋惜。”作者肯定“五四”运动本身及其目标的正确性，惋惜没有继承人文精神。更重要的是，作者从社会层面回应“五四”同为文化运动也兼具社会关怀以及对家国情运之思考的命题。首先，“五四运动”发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步的知识分子反对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割给日本。二战结束，中国再一次作为战胜国，国际上对台湾、澎湖和“满洲”仍有较多言论。中国与战败国日本之间的双边和约仍未完全落实的情况下，作者认为作为国民，应发扬“五四”知识分子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和监督之责，望与战败国日本尽快签订和约：“纪念五四，我们应当注视对日和约的发展。高扬的民气可以阻止庸弱的政府签订辱国的和约，如五四运动之所表现，也足以国家利益为念的政府于从事和约谈判时的有力支持。”其次，“五四”运动作为一种学潮是“以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做内容的，争的是大事，目标是一个，落落大方，充满进步性”。《公论报》追求民主、自由，尤其是社论栏更以“敢言”为世人所知。“公论报的社论即大多由他（李万居）亲自撰写；若非出自其手笔，则他必先行看过，方才付梓印刷。公论报的社论，多从国家、民族长远的发展来看问题，时有脍炙人口、针砭时弊之语。”⁽⁶⁷⁾由上述社论可知，《公论报》对“五四”的纪念，深意不仅在于文化的赓续，更在于对国家利益的维护。

《公论报》还密切关注祖国对“五四”的相关纪念活动，1948年5月5日报刊分别刊载南京和上海纪念“五四”活动之状况，《公论报》引用南京电文中胡适的观点：“当年倡五四运动原着重文化之非政治运动，不想却带上浓厚政治色彩，对新文化运动实为大损失。渠继举白话文运动为例称：我

(66) 《“五四”述感》，“社论”，《公论报》，1948年5月4日，第2版。

(67) 王文裕：《李万居传》，台中：台湾省政府印刷厂，1997年，第72-73页。

们的公文还远离不开古文，甚至比古文更古老，此足见吾人仍有继续新文化运动之必要。”⁽⁶⁸⁾根据报道，南京在该年5月4日展览了与“五四”相关的史料和木刻漫画，活动内容丰富，晚上举办营火会，“大会发表纪念‘五四’保障人权、保障教育、抢救民族危机宣言，要求：（一）反帝、反封建、要科学、争民主。（二）反饥饿、反迫害、要生存、争自由。（三）铲除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四）彻底实现国父‘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五）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六）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帝国主义。（七）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授待遇。（八）恢复公费制度，抢救失学危机。”⁽⁶⁹⁾文章紧接着报导上海的情况：“上海过‘五四’是近于无声息的，仅文协的文协十周年暨艺术节纪念特刊‘五四谈文艺’四日出刊，文艺界的纪念全在于此了。”⁽⁷⁰⁾《公论报》对“五四”的态度更希冀于“五四”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改革精神也恰恰回应了“桥”副刊中关于“五四”的探讨为何会呈现出看似知识分子混淆文化“五四”与政治“五四”的样貌。

是故，光复初期在台左翼知识分子们对于“五四”的定义兼具多个面向，他们希望以“五四”精神烛照当前中国现实问题，更有“问政”为国之抱负。正如该文最后指出，时下台湾学潮虽多，内容较为复杂，但是学生的胸襟和目标不如五四知识分子大度、宏伟。“目前国事蝸蟻，学生是我们这个教育不普及的国度里主要的知识分子，自不能不问政治。但是闻问政治应争其大者，应不自陷于政治。这才不失书生问政的本色。”⁽⁷¹⁾那么，作者认为重要的并非“五四”运动本体，而在于应将“五四”的人文精神继续发扬下去，同时知识分子更应该发挥好时代角色，兼具文化与问政两大职责。

（二）台湾新文学的特殊际遇与发展方向

正当《新生报》如火如荼地讨论“台湾文学建设的方向问题”时，《公论报》也刊出了吕荧的《台湾文学的方向》⁽⁷²⁾，同样指出台湾文学的性质和

(68) 无署名：《胡适对五四表示很遗憾》，《公论报》，1948年5月5日，第190号，第1版。南京电。

(69) 无署名：《纪念“五四”廿九周年——首都学生发表保障人权、保障教育、保障民族危机宣言》，《公论报》，1948年5月5日，第190号，第1版。南京电。

(70) 无署名：《纪念“五四”廿九周年——首都学生发表保障人权、保障教育、保障民族危机宣言》，《公论报》，1948年5月5日，第190号，第1版。上海电。

(71) 《“五四”述感》，“社论”，《公论报》，1948年5月4日，第2版。

(72) 吕荧：《台湾文学的方向》，《公论报》，“日月潭”第338期，1949年4月19日，第6版。

吕荧（1915-1963），本名何佶，安徽人，1947年赴台，曾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方向：“正如台湾的前途和中国的前途不可分的联系着，台湾的文学的方向也和中国的文学的方向不可分的联系着。台湾曾经受过日本帝国主义者五十多年的统治，在经济结构和文化形态上，都留着这种帝国主义统治的痕迹。在文学思想上，正也是同样的情形。”⁽⁷³⁾ 作者认为，受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文艺政策影响，许多台湾文学作品中遗存过度追求消极浪漫主义的耽美文学特点，反而忽略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和日本殖民的压迫，加之多数人民难以理解，所以也不具有更多的艺术和社会价值。“伟大的文学是多数人民的文学，不是少数个人的文学……莎士比亚的悲剧的伟大……是因为他写了当时英国社会里的人和社会，反映了现实人生，他的人文主义思想才有了血肉，才发出光辉。中国的鲁迅，也是因为人生而文学，写了现实的人和人生，方才成功伟大的人民的作家。”作者指出，台湾文学中偏爱浪漫色彩并不是因为热带南方气候问题，而在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之下形成的习惯，一个文化上精神上的牢笼”⁽⁷⁴⁾，热情可以和理性兼备，但是需要由消极的浪漫主义转为具有积极热情、理性判断，接触现实并结合社会现实的文学才是台湾文学要努力的方向：“面对现实，深入现实，表现现实——现实主义，这是世界上一切伟大文学作家的方向，也是中国文学作家的方向，台湾文学作家的方向。”⁽⁷⁵⁾ 曾子明也在《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和《文艺短评》⁽⁷⁶⁾中指出，文学作品应兼备内容和形式双重性，而形式表现的内容是尤为重要的。同时，作家要创造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他必须生活在各部门底社会层，站住自己底岗位，把握住正确的世界观，时时参加生活底实际工作，把社会当作一种生活的园地，努力参加这种实际生活而积极地慢慢去体念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笔者认为，吕荧等人的论断并没有完全否认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他指出当时台湾文学存在的问题。虽然这篇文章发表在“桥”副刊论争之后的1949年4月，但是作者所讨论的问题仍然围绕着“如何建设好台湾文学”这一命题展开，尤其关注到台湾文学历史的特殊性，并指出这种台湾文学中的“特殊性”应该向中国文学关切人生和现实的“一般性”而发展的论断。吕荧的文章发表时间较晚，《公论报》的“日月潭”副刊自创刊以来也并没有

(73) 吕荧：《台湾文学的方向》，《公论报》，“日月潭”第338期，1949年4月19日，第6版。

(74) 吕荧：《台湾文学的方向》，《公论报》，“日月潭”第338期，1949年4月19日，第6版。

(75) 吕荧：《台湾文学的方向》，《公论报》，“日月潭”第338期，1949年4月19日，第6版。

(76) 曾子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公论报》，“日月潭”第17期，1947年11月11日，第4版。

曾子明：《文艺短评》，《公论报》，“日月潭”第22期，1947年11月15日，第4版。

大幅版面回应有关台湾文学建设的争论，但是1949年1月-3月“日月潭”副刊曾针对谢冰莹《一封无法投递的信》⁽⁷⁷⁾探讨过“女兵与母亲文学”的问题，争论内容同样涉及作家的时代使命。1948年12月到1949年1月，“日月潭”副刊曾连续刊出19期黄藻如《论白居易的新乐府》⁽⁷⁸⁾，赞扬白居易以普通百姓立场，针砭时弊等反映社会现实的评论。不难发现无论是《公论报》的社评，还是吕荧的文章，在台湾文学“一般与特殊”的方法论认知上具有一致性，都可视为“桥”副刊文学论争的某种延续，亦或余响。

(三) “五四”戏剧运动与台湾戏剧、文艺大众化之研究

1948年5月5日，《公论报》“日月潭”第158期刊登了署名“芸公”发表的《五四时代的剧作家及其作品》⁽⁷⁹⁾一文，同样认为台湾戏剧也需要发扬“五四精神”，如：“‘五四’是过去了，他所留下来的，影响现在和将来我国新文化运动的进路。”作者认为，中国现代戏剧虽然始于晚清，在开始之时也具有革命色彩，但是戏剧中仍残存有浪漫的艺术观念，且不乏个人英雄主义的吹捧：“虽对封建社会，专制政治，帝国主义侵略，表现着反抗的态度，但他们前进的目标，还是迷茫的，没有一致的正确路线，作为别人工作的依归。结果终于堕落了，在剧运史上写下了可耻的一页——变质成‘文明戏’。”早期中国的文明戏受日本影响，且表演形式仅于解说，故有学者评论“文明戏者，无剧本，无舞台，无任务，无所谓内容，无所谓技术。”⁽⁸⁰⁾“文明戏”在每个时代的含义不同，一般认为是“五四”之前所谓的早期话剧，当然其中也暗含有思想和艺术特征的“新剧”概念。只不过伴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加之“文明戏”失去了前卫精神，受众群体缩小等原因，最终导致快速衰落的局面。而“五四”时期，不仅对过去的封建、专制以及帝国主义文化进行了清算，在现代戏剧方面也伴随产生了“戏剧运动”，并且领导剧作人“向戏剧革命，革命戏剧的目标奋斗”，如：丁西林反对封建道德、婚姻观念的《一只马蜂》，洪深写军阀混战中迷茫和士兵之痛苦的《赵阎王》，以及欧阳予倩

(77) 谢冰莹：《一封无法投递的信》，《公论报》，“日月潭”第281期，1949年1月1日，第6版。

(78) 署名藻：《论白居易的新乐府》，《公论报》，“日月潭”1948年12月到1949年1月22日292期，共19篇。

(79) 署名芸公：《五四时代的剧作家及其作品》，《公论报》，“日月潭”第158期，1948年5月5日，第4版。

(80) 周贻白著：《中国剧场史 外二种》，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第167页。

反封建、追求自由的《潘金莲》、田汉的《获虎之夜》、侯曜的《山河泪》、蒲伯英的《道义之交》、宋春舫的《一幅喜神》、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郭沫若的《三个叛逆女性》等作品。作者认为，伴随着五四文化运动产生的“戏剧运动”包含双重意义，即“对戏剧的本身，是‘戏剧革命’，清算过去浓厚封建色彩的戏剧，创造适合时代要求的新中国戏剧。其次，是戏剧对时代的，是‘革命戏剧’，以戏剧配合革命环境，努力作反帝、反封建、反专制等宣传，以促成时代的进步。”⁽⁸¹⁾言下之意，不仅“戏剧”要去除封建色彩，创作适合新中国时代发展要求的戏剧。同时，“戏剧”要延续和发扬“五四”，在当下仍要发挥革命精神。此外，1948年11月2日，“游艺”第29期开始增设“游艺信箱”以解答读者问题，针对台湾学生到大陆戏剧学校学习、如何投考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1948年5月2日，署名“皓”围绕台湾现存的职业新剧团问题，发表《台湾的职业新剧团》一文，称：“拥有广大的观众，尤其是受中，下层阶级大群男女老幼所热烈欢迎的‘歌仔戏’，已渐呈着碰壁现象的今日，将取其地位而代之的职业新剧团，由其所拥有之观众的广大，我们决不能低估其存在价值。”这里所指称的“新剧”其实是我们所称的“话剧”。台湾的话剧承接日据时期“新剧”之说法，在表现形式上受日本耽美艺术影响，但是本质上还是中国戏剧。作者认为：“在台湾，除一些殖民地的特殊性外，在一般的性质上，多承袭日本的资产阶级性的艺术观，所以现在台湾新剧人之所谓‘水准’，正就是以这种尺度去测量的。因此他们只知道讲究舞台上的技巧，重感情，而不知道我们内地的‘话剧’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里，所显现的气魄、理性，及其斗争性、领导性、创造性等。所以他们有一部份人，开口也‘艺术’，闭口也‘艺术’，只求观众投进他们的‘艺术’的小圈子里去，而不想如何渗入大众里去。”⁽⁸²⁾台湾的新剧团多可以在地循环演出，但是却面临两种苦闷：一种是新剧人艺术技巧上的苦闷，当时台湾某些新剧团在形式上将歌仔戏与新剧相结合，并没有解决内容上的问题。不仅观众的要求和欣赏水准降低了，作者对浪漫等艺术追求也无法完全适应大众。作者认为戏剧需要有“五四”的批判精神、重在内容的斗争性，而非高高在上的“艺术”。

(81) 署名芸公：《五四时代的剧作家及其作品》，《公论报》，“日月潭”副刊，第158期，1948年5月5日，第4版。

(82) 署名皓：《台湾的职业新剧团》，《公论报》，“游艺”第3期，1948年5月2日，第4版。

另一种是戏剧人找不到大众方向的苦闷，剧作者在大众中迷失自我位置，难以将创作融入到大众生活，缺乏现实意义。

《台湾的职业新剧团》一文发表后“梧叶”在16日的“游艺”栏目中以《话剧大众化问题——旧形式布袋戏，歌仔戏，甚至文明戏都可以利用吗？》⁽⁸³⁾对“皓”进行回应：“我国指近代演剧的历史如下：（一）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二）对剧场商业主义的反抗，（三）反映着勤劳大众的艺术欲求而发展。”他进一步指出：“戏剧的大众化，不是话剧低级化，……越完整的艺术，本来不是空虚的，本来是在人民大众中建立起来的。”两者论断的出发点都是围绕“戏剧大众化”的问题，不料“皓”却在《读“话剧大众化问题”》⁽⁸⁴⁾进行反驳，批判“梧叶”断章取义，认为其文章多引1935年秋田雨雀的文章，视野还仍停留在抗日战争之前，受日本殖民教育影响较深，对祖国语言文化仍为生疏，由此也引发了持续的论争。1948年5月30日，“梧叶”再次回应《“关于话剧大众化”：我的申辩》⁽⁸⁵⁾，由该文可看出，两者均为台湾人，只不过“皓”刚由大陆回到台湾。“梧叶”认为，台湾的戏剧发展还较为落后，不可与祖国同日而语，更不能以“台北”的标准看台湾乡村“台湾乡村是没有那么有进步性的，并且还一天加厉一天被封建的毒素毒化的喘不出气的状态”，指出在台湾，职业新剧团难以完全取代旧形式老内容的歌仔戏及其与新剧结合所产生的形式猎奇的“混生儿”，同时继承“五四”话剧也要有批判态度。因双方探讨的“话剧大众化问题在原则和意见上并没有十分出入，编辑者在同期终止了本次论争。通过两人之间的争论可以看出，在台剧作者们移植祖国文化的过程中也对台湾的特殊环境进行充分考虑，“戏剧大众化”一方面要创作适合现实、为大众所接受的艺术内容，同时也要客观考虑台湾社会环境和在地文化，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其内涵，以便更好地将戏剧传播到底层民众之间。类似的论争在《公论报》上十分常见，比如“日月潭”副刊中陈家崖和黄田玉围绕《万世师表》⁽⁸⁶⁾中飞机丢炸弹场面引发台下看客“鼓掌”这

(83) 署名梧叶：《话剧大众化问题——旧形式布袋戏，歌仔戏，甚至文明戏都可以利用吗？》，《公论报》，“游艺”第4期，1948年5月16日，第4版。

(84) 署名皓：《读“话剧大众化问题”》，《公论报》，“游艺”第7期，1948年5月24日，第4版。

(85) 署名梧叶：《“关于话剧大众化”：我的申辩》，《公论报》，“游艺”第7期，1948年5月30日，第4版。

(86) 陈家崖：《从“效果”想到》，《公论报》，“日月潭”第121期，1948年3月20日，第4版。黄玉田：《读〈从“效果”想起〉想起》，《公论报》，“日月潭”第125期，1948年3月25日，第4版。陈家崖：《我怎么想到的》，《公论报》，“日月潭”第129期，1948年3月25日，第4版。

一效果展开的探讨。陈家崖指出,在抗战之前,《万世师表》的观众无人鼓掌,而当下为什么同一个戏剧的同一场面获得了“鼓掌”效果。他指出,此“效果”并不是真正接近现实的效果,它反映的是研究者在某些方面忽略了现实的特殊性。他希望来自祖国的文化工作者不一定要创造反映现实的剧本,但是在应有剧本的基础上,应更深入、接近并发掘现实。在现实文艺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在台知识分子也要思考文艺家如何定位自身传播戏剧乃至文艺至民间的问题。

1949年5月4日《社论》在此发表《“五四”新义》⁽⁸⁷⁾一文,作者提出需要秉承五四精神为社会现代化进程以及中华民族的统一所服务:“我们今天纪念‘五四’,与任何过去的时日都有不同的意义;是因为当前的中国,现正面临历史的大变动。这变动,再也不是‘五四’当年的社会环境所能比拟,也再不能以从前的学生运动的形式与内容去适应它了。当前的变动,是中华民族的生死亡亡的挣扎,它不但深深的影响到每一个人,而且着变动根本就是每个人民所参与所要求的。……作为智识份子的学生,不能仅仅是暴风雨前的海燕,脱离了当前的大环境,任何运动都是‘浪漫蒂克’的。智识份子再不是领导份子。我们得从头学起。跟着潮流,作为潮流中的水沫。”作者认为时代不同,知识分子在社会中面临的问题和所处的地位也不同。1949年,在官僚主义压迫和“和比战难”判断下,在台知识分子所承担的时代责任比“五四”时代反帝反封建的责任更加沉重,他们内心希冀祖国的和平统一,在这样的目标下,《公论报》中的知识分子持有回归祖国、作为祖国一普通国民应有的责任感,体现出知识分子将自身定位与普通民众一样,认定作为中国一国民之身份。不同之处在于,知识分子是思想上较为进步的国民。文章进一步指出:“作为一个前进的国民,应该如何去接受‘五四’精神呢?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我们接受‘五四’精神,不是当作一种‘运动’来接受的,应该当作意识的革命来接受。换句话说,我们纪念‘五四’,是要使‘五四’的精神在我们自己身上兑现。我们不能以旧的人来迎接新时代,乃是自明的道理。‘五四’精神要求我们摒弃特权观念,抛弃优越感。在自己一份的权力与义务范围内作平凡的国民。其次,要求我们脚踏实地的去为人民大众服务,而这种服务,再不是过去高高在上的‘领导’,或站在大众背脊上来‘牧民’,而是把自己溶进群众里面,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的工作。再其次,要

(87) 《“五四”新义》,《公论报》,“社论”,1949年5月4日,第2版。

求我们抛弃动摇不定及个人主义的劣根性，去学习尊重及服从大众的意志。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的时代意义及当前的时代所要求于我们的。”在这个动荡时代，《公论报》呼吁知识分子继承并扩大“五四”的精神领域，摒弃自身的优越意识，以一普通国民的身份融入人民群众，作为其中一员与人民并肩作战。一方面知识分子需要提升自身思想的进步，进行自我革新，去除自身的国民劣根性；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作为平凡国民的一份子，需要同人民站在一起，服务并感染大众、与大众共同进步，这样可以实现文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现实意义，提升整个国民素质。

四、结语

从《公论报》创刊伊始，“日月潭”和“游艺”副刊就是聚焦台湾文化，是了解和认识台湾文化的重要窗口。副刊作者群汇聚了来自两岸的重要作家，如谢冰莹、黎烈文及其夫人许粤华（雨田）、杨逵、陈逢源、吕赫若、杨云萍、林海音、靳以先（章方叙）、郭风、周素珊（毕璞），以及丰子恺的画作。⁽⁸⁸⁾有学者指出“日月潭”副刊在光复初期台湾具有重要意义：“推动了现代诗在台的发展，提倡艺术、乡土和现实性兼备的木刻艺术；以小说、诗歌、影评、漫画等文艺形式向时政呐喊民声。”⁽⁸⁹⁾两岸知识分子在《公论报》“日月潭”“游艺”副刊携手进行文化实践和理论探讨，展现了光复初期台湾文艺重建过程中复杂且最具包孕性的面貌。《公论报》引介《大公报》的思想资源、延续《新生报》为民发声的任务，强调两岸文艺的交流是消除两岸民众心理隔阂的重要因素，致力于祖国文艺在台湾的融合和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强调批判地继承“五四”传统和历史文化，希冀继续发扬“五四”现实主义文

(88) 参见陈明成：《秘境与弃儿——初步踏查〈公论报〉艺文副刊》，《台湾文学研究》，第7期，2014年12月，第105-114页。如叶石涛《皮耶尔·罗蒂与台湾》（“日月潭”1948年7月1日第4版）；杨逵讽刺

“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社会官僚主义云雾缭绕而创作的《美丽之岛》（“日月潭”1948年10月22日第6版）；陈逢源的汉诗《草山秋与》（1948年12月12日“日月潭”第6版），《一枕》（1948年12月12日“日月潭”第6版），《时局感言》（1949年1月19日“日月潭”第6版），《重九日草山溪山阴雨楼雅集》（1949年11月9日“日月潭”第6版）；杨云萍的《一病》（1948年12月23日“日月潭”第6版）；林海音的《郁达夫之死》（1949年1月28日“日月潭”第6版）。

(89) 陈明成：《秘境与弃儿——初步踏查〈公论报〉艺文副刊》，《台湾文学研究》第7期，2014年12月。

国研纪要156 (2020.10)

化精神，强调文艺对国民性改造的效用，在“二二八事件”之后建构了介于社会和政治之间的新的文化公共领域。

A Study on the "Gong Lun Bao"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aiwan's Recovery

Zhang Yu, He Di

Abstract: In 1947, Li Wanju started the publication named "Gong Lun Bao" until 1961, and the publication period was as long as 14 years. It was one of the few newspaper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aiwan's Recovery. This newspaper has more than 20 kinds of supplements, and the author group brings together important writer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It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and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n the cultur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aiwan's Recovery. "Gong Lun Bao" is also known as the "Taiwan Ta Kung Pao" because it often quotes and discusses important social and cultural topics in the "Shanghai Ta Kung Pao". The supplements named "Sun Moon Lake" and "You Yi" are the two most representative literary and art supplements in "Gong Lun Bao" that have continued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Replacing the Old with the New" of "Xin Sheng Bao". After the "2.28 Incident", the "Sun Moon Lake", "You Yi" supplement and the "Bridge" supplement of "Xin Sheng Bao" became an important public opinion platform constructed jointly by the intellectual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In terms of continuing the tradition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 authors of "Gong Lun Bao" adhere to the idea of using literature and art to reform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advocate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Key Words: "Gong Lun Bao", The supplement named "Sun Moon Lake", The supplement named "You Yi", Literary Field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aiwan's Recovery